

中国产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 甘洁 长江商学院教授、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什么

最近中国政府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造成了当前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缺乏新的增长点,呼唤结构性的改革。其次,当今中国需要的供给侧改革,虽和美国 80 年代里根总统的“供给学派”政策在名称上有相似之处,但不应混淆,更不可生搬硬套。

首先,政策背景完全不同。里根上台时通胀严重,失业高企,政策难以两全,故提出通过增加供给来走出困境。中国经济当前是通缩状态,产能过剩。这是由于过去过分强调投资,即增加供给总量,却忽视结构,造成了供给和消费的脱节。其二,供给学派理论上本来包括投资、减税、和放开监管。在具体实施时,以减税为核心内容,而且是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这样虽可增加人们的工作热情,但说到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刺激消费而实现的。这和我们投资已经过剩,税收上应减少企业税从而提高新兴行业的投资热情有根本不同。最后,里根时代供给学派的政策造成了政府赤字扩大,大量负债的后果。政府负债占 GDP 的比重从他上台之前 1981 年的 25.2% 上升至 1989 年的 39.3%。因减税而可能造成的严重政府赤字正是我们在当前的政策安排中应当避免的。

其次,里根的经济政策引起很多争议,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供给端结构改革,首先应当深入理解当前经济的现状和困难。这也是我们自 2014 年二季度开始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季度调查的初衷。根据我们的调查采用电话访谈形式,调查样本通过对国家统计局 2008 年经营普查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 500 万)的企业按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三季度数据显示,产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开工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为历史最高水平。企业投资仍然极为疲软。12 月 12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5 年 11 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增长为 6.2%,大幅好于预期。但是,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面临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体而言,三季度产能过剩依然严重,回升的动力仍有待加强,对最新工业增长数据的解读应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产业经济总体持续探底

产业景气指数在三季度为 47,呈轻度收

缩。我们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为其扩散指数的平均。和现有的经济指数相比,该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并且具有前瞻性。

构成产业经济指数的三个子指标有较大分化。关于企业经营状况,19%的企业回答“良好”,76%回答“中等”,5%为“困难”,扩散指数为 57(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下降”的三个选项。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好”企业百分比 + “中”企业百分比 * 0.5。扩散指数在 0 和 100 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 为荣枯分界线)。企业预期经营状况基本持平,扩散指数为 52。两者均较二季度下降一个点。

最弱的是投资,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 2%的企业认为“是”,60%为“一般”,38%的企业回答为“不是”,对应的扩散指数为 32,与上季度持平,远低于荣枯点 50。与此相应,仅 10%的企业在三季度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而扩张型投资(即投资规模高于资产的 3%)更为罕见,仅占 2%。疲软的投资将进一步持续:仅有 1.4%的企业预计会在四季度进行投资,且其中大部分(70%)企业投资将用于现有设备和厂房维修更新而非扩大产能。

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的扩散指数三季度为 48,稳中有降。产品价格水平在三季度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 42,较二季度(44)的降幅更大。因此,经济已进入通缩状态。其中资本品价格下降最为严重,扩散指数仅为 36,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产业景气程度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最高 64,最低为 36。前三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64),印刷(57)和家具(56)。本季度后五名是非金属采矿(36),黑色金属加工(38),农副食品(39),木材加工(39)和纺织业(40)。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纺织业从 2014 四季度以来有三次上榜,黑色金属加工有四次榜上有名,农副食品在 2015 年一季度以来持续上榜。

产业景气程度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各地区的产业景气指数介于 40 到 57 之间。后五名为贵州(40)、山西(43)、河南(43)、河北(43)、吉林(44)。其中贵州自从 2014 年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

挑战及重点

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70%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下季度生产的重要因素,较上季度的 55%更为严重。

其次是成本,14%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9%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其他较重要因素为宏观政策(7%)、回款困难(6%)。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 2%的企业将之列制约生产的因素。这些结果在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中高度一致。

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过剩产能的消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15 年三季度由于需求进一步萎缩,产能过剩的矛盾在恶化,高达 56%的企业回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为 77。两者均为 2014 二季度有调研以来历史最高。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比国际市场更糟糕,其扩散指数高出国际市场 10 个点,这之前几次调查的结果相符。

三季度调研发现,60%的企业开工率不足 90%,较上季度的 34%有大幅上升,而开工率不足 70%的企业占比从二季度的 9%骤升至 20%。同时 32%的企业表示产能过剩超过 10%,18%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 20%。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 10%的企业认为其产能过剩超过 20%,我们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目前约三分之二的行业地区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严重行业数目从二季度的 19 个进一步上升到三季度的 21 个(行业总数:35);产能过剩严重地区从二季度的 23 个上升到三季度的 24 个(地区总数:31)。在最不景气的五个行业中,除纺织业和木材加工业之外,其余均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

与产能过剩,订单不足相应,约 1/3(32%)的企业反映在三季度回款困难,尤以民营企业为甚。而国营企业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拖欠货款。因此,企业回款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议价能力。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没有带来明显的库存问题,成品库存保持稳定。48%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80%认为其库存可以在 3 个月内消化,14%会在 3-6 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 3%的企业需要 6 个月以上消化库存。

产业经济长期以来的第二大挑战,成本上升的问题,和之前相比,在三季度不突出。单位成本轻微上升,扩散指数为 54。劳动力成本指数为 56(上季度为 60),原材料成本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 44。成本上升主要集中在有投资、用工人数上升的企业。也就是说,成本问题的缓解是由于经济不太景气所致。

三季度仅有 2%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调查中 38%的企业认为资金充足,57%回答“一般”,仅有 6%资金不足。与

疲软的投资相应,绝大多数资金不足的企业(88%)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金不足,9%是因亏损而造成资金不足。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增贷款,三季度这一比例为 6%,较二季度(8%)有所下降。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它与中国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态度调查》一致。反映借贷态度宽松的扩散指数为 70。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1%)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这些结果与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完全一致,即,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

尽管融资不是瓶颈这一结论可能与外界感受有所不同,它与中国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一致。2014 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平均每季度均以 30%的速度下降。今年三季度较去年四季度贷款余额基本持平,新增贷款仅为 5%。其基于银行家问卷调查的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持续下降,在经历 2014 年四季度指数(58%)创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之后,三季度指数再创新低至 49.9%。

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瓶颈是源于在低水位运行这个大背景,投资机会不足,企业只要还盈利,靠积累的利润留存就可运转,因此并不需要融资。即使需要贷款,也还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的调查只针对销售额大于 500 万的工业企业。但是 500 万销售额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而工业企业在除农业、房地产、金融的 GDP 中占比约 50%,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政策制定时不应忽略的结论。

政策建议

产业经济的严峻形势是长期以来制造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稍有机会即一拥而上、跟风投资造成的。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产业经济呼唤长期的产业政策
产业走出低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剩的产能要被充分淘汰,即相当部分企业面临关停、倒闭的痛苦,之后存活的企业才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研发、产品升级。因此产业政策应围绕帮助部分企业实现妥善关停、剩余企业升级、以及增加收入(扩大内需)三方面进行。

部分企业关停必然意味着解雇员工、偿还财务,并可能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这些倒闭在某些地区集中发生,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目前看来,债务问题,制造业企业银行借款并不多,倒是拖欠上游货款更为普遍。政府

应有序实现清还债务、破产程序提供保障。

产业升级方面应意识到,在绝大多数领域,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每个行业如何升级应做务实的调查研究,鼓励支持真正带来市场、就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防止大跌进。

增加收入的前提是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这需要深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其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从低端劳动力向高端技术工人的转化是必然的出路。政府应鼓励、加强高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最后,“一带一路”对产业而言,能够起到输出产能的作用,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

2、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内需为主
财政政策不建议简单地一刀切给企业减税,因为这并不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的储蓄,从而增加内需。

目前企业税赋确实较重,尤其增值税较重,使得企业不赢利也要交税,从而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对于代表未来方向、有助就业的行业应考虑有针对性地减免增值税。

短期而言,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可以带动需求-这和当年四万亿是同一思路,副作用也很明显。财政补贴对优质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也值得探索。

3、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应该是一个短期政策

本季度调查进一步说明融资不是瓶颈,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振兴产业经济。从目前产业经济的现状看来,从 2014 年开始的宽松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扭转产业经济下滑的趋势。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最多只是防止硬着陆的短期之计。若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人为维持过剩产能,不利于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然,本调查之外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可能面临融资瓶颈。这应该通过系统的大样本调查来证实。如果发现融资确实是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以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由于它们不是贷款的常规客户,仅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今后政策的针对性很重要。

最后,融资不是瓶颈不代表金融改革不重要。因为如果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当经济回暖时,融资就可能成为瓶颈。开放部分民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放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可以利用民营银行的活力,外资银行的经验和创新,一方面较快填补缺口,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现有银行的转变。

中国“村镇化”大势隐现

■ 秋风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村镇化进程已经展开。

最显著的例子是乌镇之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极为繁荣的乌镇,进入二十世纪后,伴随着沿海城市的兴起,缓慢衰落。尤其是到二十世纪中期,镇里工商业被人取消,几乎丧失生机。但八十年代以后,农民在此发展工商业;九十年代以来,旅游业则迅速发展。由此,乌镇恢复活力。在此基础上,政府确立此处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古老的乌镇一举成为最兴盛的互联网产业小镇。

乌镇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目前,不少地方已仿照这一模式建设特色产业小镇。就在北京,政府已确定,在房山区长沟镇建设基金小镇。北京已患上严重的大城市病,政府积极筹划疏解各种非首都功能。其实,不少产业是可以外迁的,而以小镇模式外迁是一个选择,可保持产业之相对聚集。长沟这样村镇优美的环境,也确实可以吸引产业从业人員外迁。

如果说,这些特色产业小镇的兴起还有较强的政府背景,那么,另外一种小镇的兴起,则纯粹是技术和市场驱动的,此即淘宝村、镇。

第三届淘宝村大会刚闭幕,据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5 年淘宝村报告》,截至目前,全国涌现出淘宝村 780 个,淘宝镇 71 个。笔者前不久与一批学者参访江苏曹县大集镇和江苏睢宁沙集镇,所见所闻,同行者无不讶

异、惊喜:一大批企业,在相对贫穷、也无资源优势的两地,借助互联网搭建的交易网络得以迅速成长。

与本文讨论问题相关的是,这里曾出外打工、上学、经商的人口又在回流,这些地方官员已经在认真地思考就地城镇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互联网重塑经济社会秩序的力量,那就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人口大规模集中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演进的必然规律么?村镇化是否可能,并且较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点简直就是确凿无疑的。

实际上,这已是我们所见证的第二轮村镇化。

过去几十年,在鲜亮的城市化背后,其实一直有强劲的村镇化潜流。我们注意到两类市镇:一类是八十年代兴起的工商业强镇,江浙、福建、广东等地,此类市镇甚多。另一类不那么显著,但也相当重要,即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兴起于大城市郊区的居住区,最著名者是京冀交界处的燕郊镇。

令人遗憾的是,囿于城市化理论,理论界对这一现象缺乏深入研究,决策者基本视而不见,这两类市镇始终局促于现有行政架构中,无法自由舒展,结果,其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文化秩序无法正常生长。尤其是后来,两者受到市、县城市化进程的挤压,今天,似已黯然失色。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面对正在兴起的第二轮村镇化趋势,学界和决策者应当有文

化和理论之自觉,也即从文化和理论两个方面,深入认识中国城镇化之内在机理。

首先,从文化角度看,由儒家文化塑造出中国人的精神与中国以西诸族群有所不同,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态上的区别主要在于:由于普遍的乡村制,在中国以西,文明始终聚集于城市,乡村是野蛮的,无文明可言,工业化就发生于享有特权的城市;但在中国,乡村制早就废除,人口、资源可自由流动,故城乡大体上是贯通的。

唐宋以来,这一点尤为明显。明清时代中国经济已深度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固然有若干城市高度发达,规模也较大,但始终不是城市一枝独秀,相反,大量工商业活动发生于村、镇,镇的作用是沟通村与城市,农村产品由此进入全球市场。由此,中国早期工业化不是造就若干大城市,而是造就大量工商业强镇,前面说到的乌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散于村镇的工业化,根本原因是,人民自由,农民可不离村而从事工、商业;在儒家熏陶下,人民普遍有自主、自强精神,即便最普通的农民也相信,通过企业家式决断,自己可以改变境遇。而这种分散的工业化适应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其效益普遍惠及农民。

有人可能争论,这样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不利于发生工业革命,此说不能成立,但暂不讨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府确实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以城、乡两分为前提,强制在城市-乡村建立空间上两分的产业分工体系,市民-农民成为两种身份。

要比“实业经营”更具分配性、更少生产性。

2003 年以来,以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长期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处“泡沫化”常态!事实如此告诉企业家(以及社会大众),放杠杆、搞投资、囤房子……是远比辛苦从事实业来得划算和快速“发达”的途径!社会风气转变的结果,是众多企业家的主业“飘移”,在转型的口号下,追求市场热点投资机会。除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外,传统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普遍被“泡沫”消磨!

供给侧改革呼唤实业精神回归

笔者一直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困境,也不在于人口红利消失、产能过剩、杠杆过高等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缺少实干实业风气,仅有的创业氛围,也是在充斥着概念创造和快速上市的造富故事中演绎。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 30 多年,前 20 余年的民营经济领域(改革初期,国有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传统的“实业兴邦”思潮是社会的主流,民间资本发源地浙江的“四千精神”为全社会所盛誉;

2003 年后,城市化超越工业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优先基石,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主流,

财富分配逐渐超越财富创造成为中国财富实现手段,干实业不如“炒房”、不如“放高利贷”,先后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法则”。这种局面不但加剧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且使得经济行为短期化,创新导向不足,增大了经济波动性,客观上形成了当前所谓的“产能过剩”和“杠杆过高”局面。可见,解决中国增长后劲、激发经济运行活力,扩张需求的基础,是要在全社会重新形成从事实业的氛围! 这是解决中国“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也是供给侧改革见效的基础。